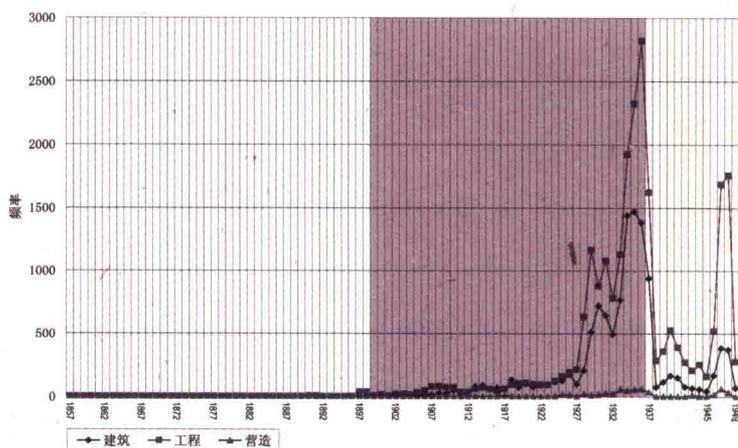


话语·观念·建筑研究论丛



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DISCOURSE

王凯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话语·观念·建筑研究论丛

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ARCHITECTURAL DISCOURSE

王凯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王凯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5. 2

话语·观念·建筑研究论丛

ISBN 978-7-112-17636-6

I. ①现… II. ①王… III. ①建筑学—研究—中国 IV. ①TU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2949号

责任编辑: 何楠

书籍设计: 张悟静 康羽

责任校对: 陈晶晶 姜小莲



话语·观念·建筑研究论丛

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

王凯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京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19 字数: 530 千字

2015年5月第一版 201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56.00 元

ISBN 978-7-112-17636-6

(268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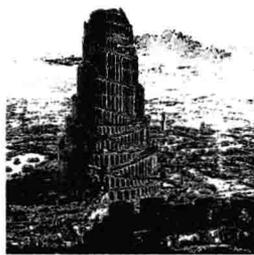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书的出版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基金资助(项目号: 51108322, 51478317)



话语·观念·建筑研究论丛

丛书前言

对研究方法的自觉是现代研究区别于传统学术的重要标志之一。近现代建筑史研究经前辈开创至今逾六十载，始终保持着清晰的学术传承脉络。各位前辈在研究方法和资料搜集等经验性研究方面做出了源远流长的非凡工作，泽被和激励着后辈去努力。

本丛书以鲜明的方法意识为线索，选目的共同特点，是以话语和观念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尝试将建筑史、观念史、社会史融合，倡导多维视角下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本土化视角的现代中国建筑史研究。

立场与问题意识

建筑历史的研究是否是一门科学？在历史面前，“我”能够做些什么？这个看似宏大的问题对确定本论丛的立场和研究问题关系重大。对于本论丛来说，历史研究不但是“揭露真相的面纱”，还原历史的真相，更是为历史寻找一种新的解读和诠释。这种诠释由来自当下的问题意识和批判性思考所驱动和制约。

本论丛的研究基于思考“如何理解近现代建筑话语乃至建筑文化的剧变”这个问题，试图与历史文献和当代研究文献进行对话。

话语与方法意识

本论丛的共同特征之一，就是尝试将建筑史放入思想文化史的大语境中考察，将关键词和话语分析作为建筑史研究的手段。

“话语”不只是写在文献报刊中的那些语言文字，而是受社会行为的驱动，并且对社会性实践产生影响的能动性力量。“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索绪尔）话语的意义不在于去寻找说这些话的人是谁，而是确认，在某个历史的时刻，某些话在某些场合下，被说出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话语，就是行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说，就是做。”话语方法试图强调话语本身的实践性力量，而不仅是作为社会现实的被动反映。

现代与本土化视角

近现代中国的“现代”，毫无疑问与西方紧密相连。在整体来自西方移植的建筑学科中，中国问题研究的西方中心倾向是与生俱来的。然而，这也正是今天反思它的原因。中国语境下的“现代”，不应该采用某一个的西方标准，而应该在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衡量和界定，即使学习西方一直是我们的目标。另一方面，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本土文化的传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甚至可以说，本土文化内部发展的需求和动力是决定外来影响作用方式和发展方向的根本因素。

总之，话语分析与建筑文化史叙述的方法相结合，外在的社会影响与建筑学科内在发展相结合是本论丛的研究策略：将语言放在它的文化、技术和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用观念史的方法拓展建筑史研究的视野和维度。

序

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进入近代时期，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这是一个传统文化遭遇危机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时代。人们最初用“以夷制夷”的传统办法来排斥西方文化观念，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则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全面引进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创建近代工业。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开创的新文化运动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颠覆了以儒家学说为主导的传统社会观念和文化秩序，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导致传统文化和道德体系的全面解体。另一方面，则引进西方的思想、科学体系和文化，提倡自由、民主、科学、进步和理性精神。

进入近代之后，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传统文化遭遇危机，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以输入西方的思想和美学为主，西方的文化观念打开了中国思想界和艺术界的视野，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世界。许多思想家进行比较研究，并致力于西方文化的中国化，开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的漫长过程。

作为文化概念的“话语”（Discourse）这个术语源自拉丁文的discursus，即通过言语进行的思想交流。话语是构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单位的语段，能完全独立存在的语言行为单位。在20世纪40至50年代，新批评派最先启用话语概念时，用来区别不同的体裁，以界定诸如“小说话语”、“诗歌话语”等范畴。话语介乎语言与言语之间，话语既不同于语言，也不同于言语，是指语言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限定下的群体表现形式，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因素、思想方法形成属于特殊群体的话语。话语表示差异，话语也确定共性，话语这个术语强调的是它作为交流的方式和手段的存在，同时，也包含了被传达的内容。

在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历史文化概念中，“话语”是构成各种文化现象的重要的人类活动，“话语”是一种功能，一种运动，一种关系，其意义也正是在这些功能、运动和关系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一种文化现象实质上就是一种“话语”，它意味着一个社会集团按照某种常规将其意义在社会中传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与其他团体相遭遇和被认识的过程。“建筑话语”就是建筑领域由于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而形成的系统的建筑理论、建筑思想和理念、设计方法、建造方式等，从而产生的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只在该领域内适用。它也包括讨论建筑的角度，所评价的标准、规范，所应用的术语、词汇、习惯的建筑风格等。由于建筑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建筑话语在相当程度上也扩散至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生活方式、言说方式、认识方式上渗透到其他话语领域，从而丰富了公共话语领域。

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发生就是与上述的一系列的现代化社会转型相伴的现象，这种话语不仅由建筑师引进，同时也不应忽视文人、艺术家和媒体的推动作用。伴随着中国近代第一代建筑师的成长，中国建筑也经历了现代的转型，以引进和移植西方的建筑、建筑话语和建筑教育体制为特征的新建筑体系逐渐形成。近代建筑从一开始就反映了传统的形式与现代技术和功能的矛盾，现代性和固有建筑形式的矛盾。中国现代建筑的诞生受到现代科学，工业化和新思想、新技术的推动，同时也是一种话语体系的成型和嬗变。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新的建筑类型、建筑技术和建筑材料相继出现。在中国的外国建筑师和在外国受建筑教育的中国建筑师也把不同的建筑风格和建筑技术引进中国，推动了现代建筑的成长。

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成立了建筑学术组织，一系列学术刊物相继创办。同时，各种辞书、报刊、画报，包括各种公共媒体的出现对传播现代建筑思想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现代建筑诞生的同时也培育了现代建筑教育，中国的建筑教育是学习日本和欧美的建筑教育而形成的，目标是培养建筑工程的人才，逐渐形成现代建筑思想，成为建筑话语建构的重要领域。

在创建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历程中，学贯中西的中国近代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起着重要的核心作用。朱启铃、童寯、梁思成、林徽因、刘既漂以及许多近代建筑师如庄俊、范文照、卢毓骏等。中国的民族主义建筑在20世纪30年代进入高潮，中国近代的第一代建筑师们借鉴西洋古典建筑的设计理念，用中国传统建筑复兴和传统的元素来创建中国的现代建筑文化。

近30年来有许多学者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和艺术学等领域研究这一转型的机制和过程，建筑学也不例外，最为突出的是关于近代建筑及其转型的研究。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有汪坦、陈从周、罗小未、邹德侖、杨秉德、徐苏斌、王绍周、张复合、夏铸九、傅朝卿、伍江、常青、赵辰、王鲁民、赖德霖、沙永杰等，以及日本学者藤森照信、村松伸，美国学者彼得·罗厄等。但是，从近代文献中的“建筑话语”研究中国近代建筑的演变及转型的当属王凯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

作为建筑史的研究，王凯博士将其纳入文化史的范畴。他借鉴福柯的“话语的历史”这样的概念，考察了建筑学作为学科在中国的出现过程，揭示了随着建筑教育的发展，随着建筑实践的丰富和国际话语的引进，随着媒体和学术刊物的探索，随着一群学贯中西的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的研究和实践，随着现代建筑思想的形成，随着新术语的引入，“建筑话语”从传统的文学话语和一般生活话语到现代的科学和工程技术话语，从而形成独立的学科话语和建筑理论话语的转型过程。“建筑话语”的转型不仅发生在新建筑，也发生在中国的传统建筑领域。他认为晚清以来的近代建筑话语的变化不仅仅是建筑学科内部的范式变革，而是与现代化进程融为一体的变革，这是一种由强制和自发的现代性引发的演变。

这部论文为我们重新从文化的角度认识中国建筑拓展了视野，为探究中国建筑的话语形态和话语史，追溯学科的独立建构提供了线索。通过建筑话语的演变，可以发现建筑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主题，成为社会发展的组成部分。从这部论文也可以清晰地认识中国近代建筑的历史演变和形象变迁，建筑思想和观念的嬗变，生动地再现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发展脉络。同时，我们也可以理解“建筑话语”的核心依然是建筑理论，公共性、学科性和现代性是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特征。



同济大学教授
中国科学院院士
意大利罗马大学名誉博士
2014年2月20日

本书摘要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社会—知识制度发生了断裂性转型。而中国的现代建筑学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社会和建筑的现代化过程而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讨论建筑的话语以及关于建筑的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本书将建筑话语的转变放入宏观社会文化背景中，通过引入的语言史、社会史、观念史结合的“话语研究”的方法，注重具体的文本分析与宏观社会背景的分析相结合、外来影响与本土建筑文化内在转变的结合，并将结构性转变作为关注的焦点，从建筑话语的社会性发生机制、话题内容的演变、话语主体的文化转型和话语现象分析等几个方面，对公共期刊和专业文献中建筑话语的演变进行描述和分析。

本书试图论证，现代建筑话语的发生与一系列的社会转变密切相关。在社会的剧烈变迁背景下，中国社会知识制度中的建筑知识逐渐由传统社会下层工匠的工作转变成社会改革和国家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进而得到主流知识阶层的关心和参与；现代学科制度体系的建立，使得建筑学知识得以从传统的与礼仪制度相关的制造知识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知识分类，近代的工程和建筑学教育的出现，更使之成为新的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晚清公共媒体的出现和现代出版业的逐步发展，为建筑话语建构了新的传播交流平台，为建筑学知识和观念的普及化和大众化提供了舞台；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几代工程师—建筑师，实现了建筑业和建筑学科的“自立”，新的职业社会身份与新主体建构运作互为因果，为建筑话语的丰富性提供了历史性的动力和机会。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的新建筑话语，通过话语形式上和建筑观念上的嬗变，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与中国传统营造话语完全不同的现代话语形态，初步完成了建筑话语的现代转型，为建筑学科的建立和进一步发展确立了知识和话语基础，为建筑学的发展和更新提供了最初的话语平台和学科知识结构，开始了中国的现代的建筑学发展的历程。

丛书前言

序

本书摘要

一 绪论	001
1.1 “话语”中的建筑：近代建筑思想研究的“话语”视角	003
1.1.1 “话语”作为方法和视角	005
1.1.2 建筑话语与近代建筑观念的演变	009
1.2 作为历史过程的“发生”与“现代转型”	011
1.2.1 “中国现代性”问题与中国建筑话语转型	011
1.2.2 “发生”：现代转型的开端	014
1.3 研究背景、目标与本书内容结构	015
二 “建筑”作为公共话语的出现	021
2.1 “内”与“外”：西方技术—文化冲击与建筑体系剧变	022
2.2 建筑在知识体系分类中地位的变迁	025
2.2.1 传统中国知识体系中的“工程”与“建筑”	026
2.2.2 从“经世致用”到“中体西用”：晚清新学兴起与“工程”地位的变迁	030
2.2.3 学术分科与知识分类转变中的“工程”与“建筑”	035
2.2.4 近代辞典/百科全书中的“建筑”	039
2.3 “建筑”在公共话语中的出现	041
2.3.1 公共报刊话语中“建筑”的出现	042
2.3.2 建筑类专业期刊的出现和分化	049
2.3.3 “建筑”话语的增长及其成因	054
2.3.4 量变：从边缘到中心	055
2.3.5 涵变：域外建筑话语的引介和建筑教育	055
2.4 本章小结：现代“建筑”话语的出现	056
三 公共话语中的“建筑”——话题演变与建筑观念的变迁	059
3.1 公共建筑话题的演变与建筑观念的变迁	060
3.1.1 1900以前：风水，卫生，新闻，猎奇	061
3.1.2 20世纪初：技术，材料，进步，工程	061
3.1.3 20世纪10年代：居室工业，城市计划，工程，技术，建筑历史	062
3.1.4 20世纪20年代：建筑师，建筑艺术，建筑历史，中国建筑	062
3.1.5 20世纪30年代：建筑学，民族性，科学，艺术，现代	063

3.2 中西交流与现代性的孕育 (1840 ~ 1900年) : 晚清公共媒体中的建筑话语	063
3.2.1 描述、叙事与体验	064
3.2.2 “水晶宫”和新闻、猎奇	067
3.2.3 民间建造程式、“风水”与《鲁班经》	072
3.3 “风水”、“卫生”与科学观念的建立 (1870 ~ 1910年)	074
3.3.1 晚清传教士“格致”期刊与科技启蒙	074
3.3.2 “风水”与“卫生”: 建筑科学观念的建立	075
3.3.3 《建筑新法》与建筑科学新观念	080
3.4 “建筑”成为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工程、建设话语的兴起 (1870 ~ 1925年)	082
3.4.1 “工程”和“建筑”成为大问题——从洋务运动到1910年	082
3.4.2 都市计划与居室工业——1910 ~ 1925年	085
3.4.3 从《建筑图案》和《实用建筑学》看“设计”内容的变化	088
3.4.4 “图案”: 早期“打样”师的工作内容	088
3.4.5 工程图学在近代的兴起	089
3.4.6 “图案”与结构计算	091
3.5 “艺术性”、“民族性”到“建筑意”: 建筑、工程的分离 (1920 ~ 1937年)	093
3.5.1 “建筑是美术”	093
3.5.2 建筑作为“民族性”的表征	098
3.5.3 “经典理论”的形成与“建筑意”: 建筑学科独立性的端倪	100
3.6 本章小结: 话语演变与现代“建筑”观念的形成	103
四 现代建筑话语主体的文化身份	105
4.1 传统话语主体的二元结构与“写作者”的文化身份	106
4.1.1 《营造法式》与官方营造文献	107
4.1.2 《鲁班经》与民间营造文献	108
4.1.3 《园冶》与造园类文献	108
4.1.4 “写作者”的文化身份	109
4.2 “建筑师”: 一种现代社会身份在公共话语中的出现	111
4.2.1 从工匠到建筑师: 土木工程师与建筑师的出现	111
4.2.2 从“鲁班殿”到“建筑学会”: 工程—建筑现代专业团体的出现与“建筑话语共同体”	114
4.2.3 公共话语中的“建筑师”: 建筑师、工程师的分离与社会身份的确立	117
4.3 古今—中西—工匠之间: 近代中国建筑知识人的知识结构和身份认同	121
4.3.1 从“士”、“工”到专业知识分子——近代专业知识分子的出现	121
4.3.2 “建筑师”话语与“中西之间”的身份认同	123
4.3.3 近代中国建筑师的个人话语与知识结构	126
4.4 本章小结: 建筑话语特征与话语主体的转型	130
五 建筑话语“现代性”的建构——关于四种现代建筑话语现象的分析	133
5.1 新术语与学科: 术语引入、统一与传统术语的转化	134
5.1.1 晚清新词语引入的文化意义	135

5.1.2	“科学名词审查”与工程术语统一	137
5.1.3	建筑术语的引入与传统营造术语的整理	138
5.1.4	从“三份术语词表”看学科的现代分化	143
5.2	“西方”与“新”：时空观念与典范转移	145
5.2.1	“古今之辨”——作为价值的“进步”观念	145
5.2.2	从“华夷”到“西方”——建筑话语中的“西方”	151
5.2.3	“西方”=“新”？——“典范”的转移	155
5.3	“中国建筑”的发明：传统重构与建筑史写作	160
5.3.1	“中国建筑”观念的产生	160
5.3.2	“中国建筑”的形象变迁	162
5.3.3	“中国建筑史”：历史写作与设计实践	167
5.4	被译介的“现代”：“卫生”与“现代建筑”的中国论述	170
5.4.1	“卫生”成为一种话语现象	171
5.4.2	“现代”与“卫生”	173
5.4.3	被译介的“现代建筑”：话语旅行与意涵转移	175
5.4.4	“卫生”与“现代”的中国性	179
5.5	本章小结：中国建筑话语的“现代性”	180
六	结语：何谓“现代”的中国建筑话语？	183
6.1	中国建筑话语的“现代转型”	184
6.2	现代中国建筑话语的特征	185
6.2.1	公共性	185
6.2.2	学科性	186
6.2.3	现代性	187
6.3	起点：20世纪的建筑话语发展	188
附录		191
附录1	关键词研究：意涵与关联域的演变	192
附1.1	建筑：居宅—营造—建筑	193
附1.2	建筑师：打样—工程师—建筑师	202
附1.3	式样：式样/样式—风格	209
附1.4	设计：意匠—打样/图案—设计	218
附录2	重要文献、事件对照年表（1857~1937年）	225
附录3	近代公共报刊中重要建筑文献列表（1857~1937年）	231
附录4	晚清以来近代百科全书、辞书中的建筑词条	282
图片索引		285
参考文献		287
后记		292

绪论

本书的讨论从三段引文开始：

一

……玻璃巨室，土人呼为水晶宫，在伦敦之南二十有五里，乘轮车顷刻可至。地势高峻，望之巍然若冈阜，广厦崇旂建于其上，逶迤联署，雾阁云窗，缥缈天外，南北各峙一塔，高矗霄汉。北塔凡十一级，高四十丈，砖瓦椽桷，窗牖栏槛，悉玻璃也，日光注射，一片晶莹。其中台观亭榭，园圃池沼，花卉草木，鸟兽禽虫，无不毕备。四周鬻物者麇集，酒楼茗寮，随意所诣。有一乐院，其大可容数千人，弹琴歌唱，诸乐毕奏，几于响遏云而声裂帛。有一处鱼龙曼衍，百戏并作，凡一切缘绳击撞、吞刀吐火、舞盘穿梯、搬演变化，光怪陆离，奇幻不测，能令观者目眩神迷……

——[清]王韬：《漫游随录》（卷二：玻璃巨室），1890年

二

上古土穴榭巢之制，一变而为栋宇，至最近则又以钢铁易木石矣。美国房屋甚为高大，易兆焚如之灾。故近日几不再用木料，即一切门户皆以钢铁为之，非但避火，且坚固而省费焉。此亦建筑上之一大进步也。

——林乐知、范祎：《智能丛话：建筑之进步》，《万国公报（上海）》，1905年

三

……我们对于建筑艺术的主张，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得到一种答案了。我们以为派别是无关重要的。一件成功的建筑作品，第一，不能离开使用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所以在这四种原则之下，我们就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新的风格出来，作为我们这一个时代文化的贡献。

——陆谦受、吴景奇：《我们的主张》，《中国建筑》第26期，1936年

这三段引文都出自清末到近代中国的重要报刊或者出版物^①，其发表时间不过相差三十多年。对于中国的建筑思想史来说，三十年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可是，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短短的三十年间，几段文本之间，无论在文字修辞还是在关注视角和理解观念等层面，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第一段文章，用一种在今天看来完全异样陌生的方式谈论建筑。后面一段的言论则完全已经采用了专业的话语，以至于即使放在今天的媒体中出现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而这一切的变化，却是在一段让人惊异的极短的时间之内发生的。

这并不是精心寻找的特例，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在1898年百日

^①对于一般的社会大众来说，《格致汇编》和《万国公报》无论从发行量和影响力来说都属于当时的主流媒体；而《中国建筑》对普通社会大众来说虽然属于专业杂志，但是发行量也相当可观。

维新前夕，中国的思想和体制都刻板地遵从了中国人特有的源于中国古代的原理。仅仅12年后，到了1910年，中国人的思想和政府体制，由于外国的影响，已经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思想方面，中国的新旧名流（从高官到旧绅士，新工商业者与学生界），改变了语言和思想内涵，一些机构以至主要传媒也借此表达思想……如果把1910年的中国思想和体制与1925年乃至今天中国的相比较，就会发现基本的连续性，它们同属于相同的现实序列。另一方面，如果把1910年和1898年年初相比，人们发现，在思想和体制两大领域都明显的彼此脱离，而且越离越远。”^①

在建筑领域中，情况也是一样。仅仅在19世纪中期以前，工匠的建造行为还是和社会主流上层的士人基本不相关的事情；而在中国的文献分类法中，与建筑有关的知识还在整个知识体系中分布在“经史子集”的各个角落，无论是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基本文献的《营造法式》，还是各种造园文献，在整体知识体系中，都是儒学为主体的传统知识体系的一小部分，甚至不能算作一个完全独立的分支，其存在的价值主要作为实现“礼制”的辅助性技术手段^②。建筑的技术经验，一直只有工匠师徒之间口传心授，往往出于保密或者受到工匠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少诉诸文字记载。而正统的读书人一般把营建活动看成是工匠的事情，除了个别有特殊兴趣的文人以外，读书人对于工匠营建制造之类的事情一般是不太关心的。中国古代的建筑技术知识往往缺乏充分的文献记载，也与这种原因有关。

可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不仅在专业杂志里，即使在一般的大众媒体中，现代的建筑话语都似乎“突然”地大量出现了。在1920年代末期逐渐出现的专业媒体和专业出版物中，关于建筑的讨论甚至已经开始成为主流“学术”的一部分了。

显然，在跨越晚清和民国早期的短短几十年里，类似于福柯所讨论过的某种知识型的“断裂性”^③发生了。那么，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20世纪30年代已经出现的、并且影响至今的这种“新的”建筑话语，到底是如何出现的，它的来源是什么，在性质上又应该如何认识呢？进而，这种建筑话语乃至思想、观念上的巨大变革的发生，在制度公众观念层面的发生又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本书的目标就是研究与这种话语的转变相关的问题。希望从宏观的社会文化的“现代转型”视角，去关注建筑话语中的“现代性”是如何发生的。

1.1 “话语”中的建筑：近代建筑思想研究的“话语”视角

今天，各个学科中的研究正逐渐认识到：语言使用中的变化方式是与

^①任达. 新改革命与日本——中国, 1898~1912.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215.

^②参见: 徐芬斌. 中国建筑归类的文化研究——古代对“建筑”的认识. 城市环境设计, 2005, 1: 80-84.

^③参见绪论部分1.2.1节的内容。

①[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1.

广泛的社会文化过程联系在一起。

——[英]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第1页^①

中国的近代建筑史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近代建筑研究”项目取得了一批的研究成果,从1986年到1996年,共召开了5次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全国性研讨会。从1998年起,每两年一次,分别在太原、广州、宁波和开平、南宁等地召开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国际合作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目前,国内近代建筑历史领域现有的研究中,一般是以实物为主导。在近代建筑遗存实物的调查研究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汪坦先生和藤森照信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开始的近代建筑调查以来,一批资料严谨翔实、涉及地区广泛的成果已经陆续出版。特别是关于近代上海、北京等地区的研究成果尤为丰富。然而从对历次近代史会议论文的统计可以发现,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中,关于近代建筑思想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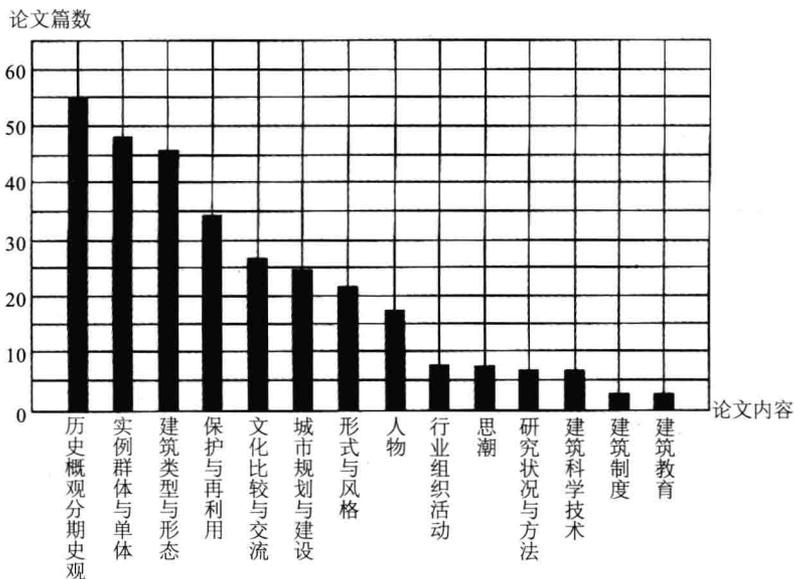


图1-1 近代史论文集篇目分类统计

赖德霖先生在总结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近代建筑史研究的综述性文章^①中指出：“中国近代建筑话语或思想的形成无疑是近代建筑史研究最重要的问题……目前对于中国近代建筑思想的研究可以说仍集中于民族主义和现代主义两个方面。”^②思想层面的研究多以宏观的论述和重要人物为中心^③，而且多集中在20世纪30年代高峰时期的讨论，而涉及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讨论不多，更少有对作为建筑师群体的整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社会宏观的思想观念讨论。这可能和以下两方面的因素有关。

一方面，从近代建筑发展的客观情况来看，近代经济和建筑技术发展不够充分，连续的战争和社会动荡使得建筑发展的黄金时期过于短促，来不及发展出自己的建筑理论。同时，中国近代建筑脱胎于传统建筑行业，“重技术、轻思想”，再加上实践发展时期较短，本来原创性的建筑学术思想就比较少，特别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师和建筑专业杂志出现之前的建筑思想材料分布分散，由于核心重要的人物还没有出现，更使得思想研究很难具体化。

另一方面，研究理论、方法的不足。由于中国近代建筑和日本近代建筑、西方建筑的复杂关系，日本学者对亚洲近代建筑史的研究方法、国内学者对西方建筑史的理解都对研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从20世纪30年代中国营造学社以来，中国学者的建筑学术研究从方法上就受到日本学者的很大影响，这在近代建筑史研究注重实物考证和基本信息搜集整理等方面表现得很清楚。另外，对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堪称西方建筑传播和接受史的中国近代建筑史而言，国内西方建筑历史研究与教学的影响也很重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以风格分类为主要特征的针对建筑实物的研究方法，代表了几代前辈学者所开创的西方建筑“风格史”的叙事模式。虽然近年来国内西方建筑历史理论研究进展迅速，但是在教学层面尚无全面整体性的突破，这也造成了近代建筑思想史的研究尚缺乏有效的方法性工具。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西方史学理论先导性地运用对近代建筑研究的深入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以赖德霖、徐苏斌、李士桥等人的研究为代表。^④然而到目前为止，研究的主要焦点还集中在重要的建筑物或主流建筑师的思想等方面，对社会一般大众的建筑观念的讨论也许是因为缺乏有效手段，所以还为数很少。本书试图通过引入社会史与观念史结合的“话语研究”的方法，希望可以有助于弥补这一遗憾。采用“话语”为视角和方法，本书希望通过把握“建筑话语”的“言外之意”，来探求和重绘社会大众的建筑观念图景。

1.1.1 “话语”作为方法和视角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话语”

① 赖德霖，从宏观的叙述到个案的追问：近十五年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评述，2001。文章共分为9个部分：①关于近代建筑史分期问题；②关于近代建筑的生产关系，即建筑系统的现代化过程；③关于近代建筑教育；④关于近代中外建筑师；⑤关于近代建筑类型与技术；⑥关于近代市政与城市规划；⑦关于近代重要城市建筑；⑧关于近代重要建筑作品；⑨关于近代建筑思想。

② 赖德霖，从宏观的叙述到个案的追问：近十五年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评述，2001。

③ 具体相关叙述可以参见赖德霖，从宏观的叙述到个案的追问，2001。

④ 详见后文1.4.1的讨论。

①参见：董兴涛，“话语”分析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历史研究，2007，2。

②巴赫金，巴赫金访谈录，巴赫金全集（第5卷），钱中文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416。

③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巴赫金全集（第2卷），钱中文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59。

④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136。

⑤福柯的“话语”观和对“话语分析”的认识，在当代的各种话语理论中具有某种奠基性意义，但也只是一家之言。此外，像拉克劳（Ernesto Laclau）、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等人的理解，就与福柯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以费尔克拉夫为例，他认为“话语”指的是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分析则必须是一种多向度的分析方法，即任何话语“事件”（即任何话语的实例）都应同时被看作是一个文本实践、一个话语实践和一个社会实践的实例，它必须包括三个向度的分析，即文本内部的语言分析；说明文本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的话语实践向度的分析，以及将其置于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利关系中的社会实践向度的分析。特别是他把福柯所轻视的对实际文本的文本分析和语言分析，作为“话语分析”的重要内容来对待，并强调了描述文本与文本之间、文本与话语习俗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的所谓“互文性”研究之重要性。参见：诺曼·费尔克拉夫，话语与社会变迁，殷晓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4。

⑥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discourse）已逐渐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常用的概念。

“话语”作为一种方法，源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语言学转向”^①。然而，从一开始，它就超越了语言学本身。在传统语言学里，“话语”通常被视为一种规则明确、意涵清晰而确定的言说。在将语言学里的“话语”转换为人文社会科学特殊理论范畴的过程中，巴赫金（M. M. Bakhtin, 1895—1975）贡献突出。在他看来，作为一种言说或“表述”的“话语”，其真实含义只能通过社会“交往”与“对话”实践才能获得：“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②因此，处于“对话”关系中的话语，“无不充盈着社会情态和意识形态内容，无不具有事件性、指向性、意愿性、评价性，并渗透着‘对话的泛音’……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的标志”。^③这种注重语言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运用所产生的实际意义和功能之“话语”，由于其上述种种属性，获得了进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畴的可能。

最终奠定思想史中“话语”理论基础的是法国哲学思想史家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他将“话语”定义为“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其所谓“临床治疗话语”、“经济话语”、“博物史话语”和“精神病学话语”等，都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话语”的^④。在福柯看来，每一种“话语”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单位”，它具有特定的实践功能。“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还“建构”（construct）社会事物与社会关系。在他那里，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建构”着各种至关重要的事物（如精神疾病、艾滋病、性等），并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地位（如使之成为医生或病人、看守或囚犯等）。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一种互相依赖、互相生产的关系。权力必须进入特定的话语并且受特定的话语控制才能发挥其力量，没有话语，权力就缺少运行的重要载体。因此，话语的运用作为权力运作的一种形式，构成了人们社会历史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一种历史表述，包括谁来表述，怎么表述，以及表述中的真与伪等，实际上已是经过具有约束性的话语规则选择和排斥以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看，话语分析其实成为一种或隐或显的权力关系分析。^⑤

运用来自西方的“话语”理论讨论中国近代的建筑观念问题，是一件“既不需要隐藏，也不值得夸耀”^⑥的事情。问题在于，为什么要采用“话语”这一视角来观察现代早期中国建筑观念的转变？这种理论方法对于把握中国的现实是恰切有效的么？

就广义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来说，以“话语”来指称、论述或分析某些过去我们习惯中以“概念”、“观念”、“思想”和“思